

董子文化与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董仲舒的养生学	2
(一) 理论基础: 天人合一——“循天之道以养其身”	3
(二) 养生本质: 气论——“养生之大者, 乃在爱气”	4
(三) 精神养生: 阴阳论——“能以中和养其身者, 其寿极命”	6
1. 致中和——“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	6
2. 悦情志(阳)——“常以阳德生其意也”。	8
3. 少私欲(阴)——“体情而防乱者也”。	16
(四) 物质养生: 五行论——衣食住行性	19
1. 饮食做到“臭味取其胜”。	19
2. 穿衣做到“衣欲常漂”。	22
3. 居住做到“居处就其和”。	23
4. 行为做到“体欲常劳”。	24
5. 房室做到“不盛不合”	25
二、董子文化与党性修养	28
(一) 社会历史观与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29
(二) 独尊儒术与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	34
(三) 民本思想与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	41
(四) 仁义观与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	47
(五) 义利观与共产党人的格局境界修养	56
(六) “必仁且智”与共产党人的人才观	72
(七) “至廉而威”与共产党人的廉洁自律	80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谆谆教导，言犹在耳，全党铭记，影响至深。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注重吸收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扬弃，用于加强自身修养，直接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新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共产党人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资源，也是促进全党保持先进性，践行“四个自信”的现实路径。董仲舒是西汉思想家、哲学家，是中国古代优秀的贤臣廉吏，他的个人经历和治世思想，为我们共产党人强化党性修养、提升思想境界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理念方法。

一、董仲舒的养生学

据今人考证，董仲舒活了 90 岁左右，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是少见的长寿星，即便在今天也算是高寿之人。“德高人长寿，心宽福自来”。除体质遗传原因外，精于修养、心思平正是他得享高年的重要因素。他继承了儒家的“仁者寿”“德润身”的养生观念，认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他说：“天长之而人伤之者，其长损；天短之而人养之者，其短益”¹。即，上

¹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天给了长寿的基因，如果荒淫放纵、伤害身体，本来的长寿就会变成短寿；上天给了短寿的基因，如果品行端正、精于调养，本来的短寿就会变成长寿。对于如何修养身心，董仲舒给出了一整套理论和实践方案。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借鉴董仲舒的养生之道和修炼之术，加强自身修养，修身、养心，铸牢拒腐防变道德防线，增强肌体的免疫功能，善保革命的本钱，以强健的体魄为国尽忠、为民服务。

（一）理论基础：天人合一——“循天之道以养其身”

天人同质同构是董仲舒养生理论的认识基础。他说“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²，”即，按着上天的运行规律来保养身体，才是正确的养生方法。为什么要按照天道来保养身体呢？因为天人同质同构，天人合一。

天生育人类，也养育人类。他说：“万物非天不生”，“生育养成，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瞻足之意，可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高功无已，终而复始”。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复制物，是效仿天的形象生成的，提出了“人副天数”的理论。他说：“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³在他看来，天是人类的始祖神，天生人就像父母生育子女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董仲舒反复强调，人的生理构造也是天的复制品，人体有三百六十六块小骨节，跟一年的天数相副；人体有十二块大骨节，

²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和一年的月数相副；人的四肢与四季相副；人的五脏与五行相副，天数与人体是完全对应的，即：“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⁴天与人在外部形象和表现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人与天不仅形式相似，而且还有内在的联系，天以自己的意志、性情创造了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⁵总之，“天之副在乎人。”天和天具有相同的情感意志和道德属性，明确地说明了人不过是天的一个缩影罢了。

董仲舒论证天人同类，旨在表明人的责任是实现天的意志，做人做事、为官为政、修养身心，都要按天的意志和运行规则进行，即为“循天之道”。

（二）养生本质：气论——“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

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之间充盈着一种物质——气，天地和人生命的运行是通过“气”来实现的。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⁶意思是说，“天”这个无所不包的宇宙充满了气，天与地是他的总体轮廓，五行是他的基本组织元素和运行特征，阴阳是气的两种势力，这两种势力的运行消长形成了四个季节的交替变化。不论阴阳还是五行，都是“气”的

⁴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⁵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⁶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一种表面形式，“气”在他的思想中也居有重要地位。

作为人来说，“气”是指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活动能力，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原动力，也是形与神之间的纽带，是一身之主，是人之根本。人体的呼吸吐纳、水谷代谢、营养输布、血液流行、津液濡润、抵御外邪等一切生命活动，无不依赖于气的功能来维持，“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气主宰着生命。

在中医的理念中，气是非常玄妙又重要的一个概念。很多时候我们讲求养生的方法，就要从养气入手开始培养。俗语说：“人活一口气。”如能顺畅无阻，则机体康健。气旺则盛，气虚则衰。有气则生，无气则亡。养生要养气，调病也要调气。

对人的生命来说，这种无形的气，比有形的食物更重要。董仲舒说“民皆知爱其衣食，而不爱其天气。天气之于人，重于衣食，衣食尽，尚犹有闲，气尽而立终。”所以，他的结论是“凡养生者，莫精于气”“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

养气就要弄清人身体之气产生的根源。人的气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董仲舒说“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之谓意”“万物动而不形者，意也”。心是气的根源地，“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人的所思所想产生气，阳光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健康之气，阴暗的思想产生消极的病态之气。

所以，养生要从两个方向上发力：从精神层面说，按气的阴阳两种表现，以养心，以颐养人的精神为主；从物质层面说，按着气的五行表现特征，从衣食住行性等生命活动中调解阴阳平衡。

(三)精神养生：阴阳论——“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

1.致中和——“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

致中和，是董仲舒养生思想的基本原则，不管是精神方面的养心，还是物质方面的饮食，都要达到“中和”的状态要求。他说：“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他认为：“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⁷。这儿的“中和”是他从天地运行状态中发现的基本规律。

“中”“和”是中国传统思想史的两个概念，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和行为准则。《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是说“中”“和”是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属性和通行规则。董仲舒对“中”“和”两个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并将其运用于国家治理、文化创作和身体保养等领域，是他思想理论的基础概念。

董仲舒的中和思想与他的生活轨迹有直接关系，他的理论有着显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痕迹，这也是他的局限性所在，特别是他的基础理论——阴阳论和五行论，带有十分典型的中原温带季风性气候的影子。他生活的年代，地理知识是有限的。他从德州地区成长起来，以“贤良文学之士”被荐举，迁到长安为官生活，一直没离开中原温带地区。他以这样的生活视角，来观察寒来暑往、阴阳消长，以此来思考归纳天地宇宙的运行规律。他的理论基础通篇没有离开四季更替、东西南北的中原地区地理和气候规律。长年生活在赤道和南北寒带地域的人是看不懂他的论述的。他的“中和”理论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他说：“天有两和，以成二中”⁸。

⁷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⁸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这“两和”“二中”指什么呢？在他的理论中，可以概括为：极阴极阳为中，阴阳相半为和，分别体现在地理方位和季节变化方面。

二中：指北方盛阴之地和南方盛阳之地，对应冬至、夏至两个节气，这是天地的“二中”。他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⁹。天地之间充满阴阳之气，起伏盛衰，终而复始。阳气起于北方，也就是冬至之时，到南方即夏至之时，阳气达到极盛状态。阴气起于南方中夏之时，就是夏至，到北方，即冬至才达到极盛状态。到极盛之后，阴阳二气开始交接转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周年，董仲舒称之为“天地终始”。“阳气……盛极而合乎阴，阴气……盛极而合乎阳，不盛不合”，达到盛极状态开始转化，是他理论“中”的含意。这样看来，董仲舒的“中”有终始的意思，也有物极而反的意思，即，在极盛状态，物质开始变化的时刻，孕育产生新事物。

两和：在东方和西方，阴阳相半，对应春分、秋分两个节气，这就是天地的“两和”。“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¹⁰。“和”是天地运行最平正的状态，阴阳二气平衡，对应季节的春分、秋分，气候温暖，不阴不阳，不冷不热，是最适宜万物发育生长的环境。

“中和”理论是董仲舒应用哲学的起点。在治国和养身的过程中，都要体现“中和”的原则要求。在身体保养中要做到：“男女体其盛，臭味取其胜，居处就其和，劳佚居其中，寒暖无失适，饥饱无过平，欲恶度礼，动静顺性，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此

⁹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¹⁰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中和常在乎其身，谓之得天地泰”¹¹。

是说：男女之间的婚育媾合要达到精力旺盛的状态才能进行，饮食要注意选择清宜胜神的味道，住处要求平和安适，运动做到劳逸适中，夏要避暑，冬要御寒，做到冷暖适度，喜爱的事物、厌恶的东西都要讲究其中的道理，适可而止，不可偏执，不要无缘无故地乱发脾气，活动、休息要顺应天性，不可过度勉强，忧愁、恐惧时要快速回复到平正状态，做到这些，身体就始终处于中和状态，就达到了天地安适之道的要求。这样的人寿命会得到延伸而长久。不能处于天地安适之道的人，他的寿命就会受到损伤而短促。即“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长，不得天地泰者，其寿伤而短”¹²。

2. 悦情志（阳）——“常以阳德生其意也”。

董仲舒接受了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观点，他说“行必终礼，而心自喜，常以阳德生其意也”，按照阳气的建设性价值趋向，以德行事，与人为善，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就能实现心情愉悦舒畅，身体也会健康长寿。

① 阳德的建设作用。

董仲舒依据阴阳二气在作物成长中的不同作用，他得出了“阳德阴刑”“阳尊阴卑”的结论。他说：“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

¹¹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¹²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大德而小刑之意也。”¹³“阳出实入实，阴出空入空，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也”¹⁴。“阴终岁四移，而阳常居实，非亲阳而疏阴，任德而远刑与。”“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¹⁵

董仲反复强调阴阳、德刑之间的主次关系，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和伦理关系中。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他也说：“故阴，夏入居下，不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在夏季，阴伏而不出，这就是所谓“居下”。在冬季，阴气出来了，居上了。可是在冬季，阳气已衰，万物本来不能生长养育。所以阴气实际上不发生很大作用。这就是所谓“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这个“不用之处”，就是所谓“空位”。阳气实际起着生长、养育万物的作用，这就是居于“实位”。他的结论是：“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¹⁶用我们的矛盾论来分析，董仲舒所看到的自然界中阴阳作用在生活中的表现，本质上说，反映的是矛盾的特殊性，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

他在强调阳气的主导作用时，也看到阴气的辅助作用。“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¹⁷“权”是配合协

¹³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¹⁴ 《春秋繁露·阴阳位》

¹⁵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¹⁶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¹⁷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调的意思，阳气没有阴气的配合协调，也不能单独地发挥作用。“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¹⁸“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¹⁹是矛盾双方的共同作用成就了事物的变化，万物的生成、社会的治理都是这种共同作用的结果。

董仲舒的阳德阴刑观念今天我们称之为建设性思维、建设性作用。“建设”的意思是设置、创立，就是从无到有的初次设立或建立。反义词为“破坏”。由此可以理解，“建设性”指维护和保证所涉及的对象（如项目等）向着前进的、完满的方向进展，而不是以“促退”为动机，产生抑制作用。比起滥用刑杀的破坏性作用来说，文德治国、休养生息的建设性价值更值得珍视和推崇。

从他“阳德阴刑”的理论出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象阳气催生草木庄稼一样，不断地孕育、谋划，不断地投放能量、物质，慢慢地生长，连续地建设，终究会长大有用之材，建成可用之物，而不能象阴气萧杀万物那样，不断摧折，造成万物空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建设性观念。

现实生活中，“建设性”是让问题可以被解决，让东西能够被建设出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元素。生活中的“建设”，比较容易理解，就像搬砖造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地垒起来，房子就建设起来了。抽象的“建设”，不可见，但是和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比如说学习课本知识：通过一个一个知识点的串联，然后

¹⁸ 《春秋繁露·暖燠常多》

¹⁹ 《春秋繁露·基义》

搭建成一个知识体系。

所以，“建设性”是我近几年一直比较重视的一个概念，广泛应用于外交谈判、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中。它源于我对“价值”的理解。在我看来，判断“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是否解决问题”：如果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果解决的问题是和更多人的利益相关联，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项目就更有价值。

建设性作用意为具有创意的积极促进事物发展的性质，对事物的发展有积极改变的意愿及方法，有助于得到好的结果，如某人某事对总体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性开创性的作用。多指做有实际作用和效果明显的事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你做了什么，做了会有什么效果的事情。建设性问题就是提出的问题针对了某事或某方面的关键部位，如果该问题能得到解决，就能让事情得到相应的推动，或者是能做出效果斐然的事情。建设性语言是指，你对某件事提出异议的时候，一定要附有你的更好想法或改进的方法。

建设性作用的前提是建设性思维，对客观存在的正确认识，能够指导实践活动，改造客观存在。建设性思维不仅包括在创造性活动中具有发现、革新品格的思维，也包括发现问题的思维和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思维，从而能在一般人不注意的事物上看出重要问题，创造出新产品、新成果或提出新的理论。从客观事物到创造一件作品，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人们头脑对客观事物进行加工的思维活动。思维活动中求异、独创、组合、预见的思维具有广阔性、批判性、灵活性和深刻性，就能产生综合作用的结果，全面、丰富、完整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驱动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

所谓建设性意见，就是创见即独到的见解，说白了，就是具有新意的看法或提法，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没有先例，而别人还没提出过的意见，就是比较有使用价值，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意见。

②君子的坦荡襟怀。

董仲舒看来，阳德的建设性价值表现为“君子”的坦坦荡荡、襟怀宽广。他说：“君子道至，气则华而上”，一个人遵从正道，他的内部真气就会洋溢向上，精神气质表现得饱满昂扬，所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人要从内心本质上修养自己的心性，就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董仲舒认为，君子作为有道德、操守之人，其德行是完美的，他把君子之德视为美玉，或以美玉喻君子之德，说明其清纯不污、不隐其短、不掩其瑕的高贵品格。他说：“玉有似君子……玉至清而不隐其恶，内有瑕秽，必见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润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洁也；廉而不杀，是义而不害也；坚而不磨，过而不濡，视之如庸，展之如石，搔而不可绕，洁白如素，而不受污，玉类备者，故公侯以为贄。”君子有如此纯仁淳粹的美德，入污泥而不染，发于事而润泽，永远以一种阳光的状态出现，所以为人们所崇爱、效法。董仲舒赞美君子之德，意在叫人学君子、做君子。

君子的襟怀坦荡，充满正能量，容易长寿。他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取天地之美，即是按照阳德的建设性原则办事，精神就是愉快的，是养生的好方法。“和乐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内充也；外泰不若内充，而况外伤乎？忿恤

忧恨者，生之伤也；和说劝善者，生之养也。君子慎小物而无大败也。行中正，声向荣，气意和平，居处虞乐，可谓养生矣。”

相反，如果心底阴暗，斤斤计较，精神经常被细琐利害困扰，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少，气少者难久矣”，所以要做到“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

要始终保持精神的顺畅状态，千万不要出现抑制郁闷的状态。因为“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后、平行而不止，未尝有所稽留滞郁也”。这是天人一体、同质同构的本质决定的，“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气，使之郁滞，不得以其正周行也”。也是中和之道的应用，“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

董仲舒反复强调，要学习天的运行状态，顺畅周流，无所阻碍，绝不能让精神处于抑制状态。“其在人者，亦宜行而无留，若四时之条条然也”“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其宜直行而无郁滞，一也”。这样就能“神无离形，而气多内充，而忍饥寒也”。

古代君子的这种坦荡襟怀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学习的地方。君子，原意为君王之子，强调地位的崇高，今天，与“小人”相对而称，泛指人格高尚的人。我们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要做堂堂君子、大雅君子。习近平指出：“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

公道正派。”党性纯正的干部，忠诚老实，襟怀坦荡，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普通人而言，是“德行”；对共产党员而言，就是“党性”。

一名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不是天生的品格，而是在党的教育下和党的性质、宗旨的要求下后天形成的党性。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无私才能无畏，正因为如此，一名共产党员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应目标明确，信心坚定，乐观向上。从我们党诞生那一天起，我们就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我们党从来没有失去对胜利的信心。一名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不是靠一时心血来潮就可以拥有的，而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修养的过程。道德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从小处入手，自觉地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不断地提高素质，贵在坚持，重在实践。

③情志的适度调控。

中医有一种说法：情志致病重于六淫。

所谓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邪因素，这是发病的外因。如果气候变化异常，过冷或过热，或非其时而有其气，以及过于急骤，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使机体不能与之相适应的时候，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情志指七情六欲中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发病的内因。身体常常受情绪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要人们细心观察，情绪影响健康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人在紧张时，有的人手心会出汗，有的人老想上厕所，有的人会头痛；在心事重重

时人会没有食欲；医师嘱咐高血压病人不要激动发怒，否则容易“爆血管”等等。重要的是情绪会通过内分泌给人的五脏留下好的和不好的痕迹，好的痕迹会促进健康，延缓衰老；不好的痕迹会促进衰老，有损健康。

情志与脏腑的关系是“七情生于五脏又伤及五脏”。因为脏腑的生理活动必须以气血为物质基础，而精神活动又是以脏腑生理功能活动为表现，所以情志活动与人体脏腑气血关系密切。南宋的《三因方》云：“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悲伤心包、惊伤胆、恐伤肾。”虽然情志直接损伤脏腑有一定的选择性，但不能机械地认为怒只能伤肝，喜只能伤心，等等。因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情志活动复杂多变，有时一种情志过激会伤及几脏，有时几种情志过激同伤一脏。

人的情绪在正气（阳气）不足、邪气上升时情志波动最大。正气充足的人，乐观豁达；正气不足的人，悲观绝望，忧思绵绵。所以，把正气升提起来，人的精神面貌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所谓七情产生的病，都会远离我们。人的正气不足主要来自肉体、体力、饮食、生活习惯、人际关系、情绪等多因素的影响。大量事实证明，控制好情绪，少生气、少发怒，就能提升阳气（正气），人能少得病、不得病，这完全取决于你平时如何把握，良好的心境全靠你自己创造。

董仲舒说：“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人要学习天的这种性格规则，一旦产生极端的情绪，就要按着阳德的要求，把情绪调整到中和的状态：“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

之德，不平不可以发刑罚之威。又可见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无德，不平无威，天之道也，达者以此见之矣”。“我虽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

董仲舒引用了公孙尼子的观点，列出了十种损害人体的现象：“里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热胜则气耗，寒胜则气滞，泰劳则气不入，泰佚则气宛至，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慑”。这十种现象都是违反中和原则的，损害人身的正气，必须做到“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

他说：“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大可见矣。是故男女体其盛，臭味取其胜，居处就其和，劳佚居其中，寒暖无失适，饥饿无失平，欲恶度礼，动静顺性，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此中和常在手其身，谓之大得天地泰。大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畏，不得天地泰者，其寿份而短。短长之质，人之所受于天也。”

董仲舒由天人合一论，导引出君子论。人受命于天，由天而生，与天相类，故观察万物的不同变化，求知万物的变化规律，是为了表达天意，实现天意。中和之道是天地运转永恒大道，得此道、守此道者寿长，否则寿短。人的寿命的长短，由天所受之质而定。君子只能察此道、顺此道而居处修养，这便是中和常在其身而不违天意之道、之德、之行。就是说，君子之道、之德、之行，在于体现天意，完善人生，保障健康。

3.少私欲（阴）——“体情而防乱者也”。

私欲是私人欲念。从生物学、生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讲，“私

欲”就是人的自我满足，从外界获得物质是生命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是私欲的原始动力。但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语境中，“私欲”指的是不正当的欲望，即通常所说的过度酒色财气名利等内容，是人精神中的阴气。

私欲来源于人满足生存最简单的需要，这是人之常情，要正确看待它。不管是动物界还是人类社会，私欲都有恶性膨胀的本性。动物会为了一块食物相互残杀，可有时我们也会看到一群食肉动物一起分享美餐的场景。面对私欲，有人会斗争，有人会容忍，有人会接受，也有人会利欲熏心，走上不归路，也有人会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不断战胜自己的欲望。

① 笃礼薄利。

董仲舒指出，君子之德还在于笃于礼，尚于义，薄于利，以仁义之德正己治人。他说，由于“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所以“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人人都有义利之心，物欲之求，而君子与小人的分途是君子能以义为上，以礼为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论行动，“笃于礼，薄于利”，“终日言不及利”，小人则相反。据此，董仲舒主张以“礼”、“义”为标准来端末塞源，体情节欲，以防其乱，这是君子之德，亦是君子之责。

他说：“利者盗之本也，妄者乱之始也。夫受乱之始，动盗之本，而欲民之静，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故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君子的视、听、言、动等，都要以礼为度来规范要求自己，同时要以此来安民防乱，

这样便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身行正道，保持社会和谐安定，这就是行人道。

②少私寡欲。

老子《道德经》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少私，是指减少私心杂念；寡欲，是降低对名利和物质的嗜欲。因为私心太重，嗜欲不止，欲望太高太多，达不到目的，就会产生忧郁、失望、悲伤、苦闷等不良情绪，从而扰乱清静的心神。使心神处于无休止的混乱之中，导致人机体紊乱而发病。

董仲舒说：“纯知轻思则虑达，节欲顺行则伦得，以儻静为宅，以礼义为道则文德。是故至诚遗物而不与变，躬宽无争而不以与俗推，众强弗能入。蝮蛭浊秽之中，含得命施之理，与万物迁徙而不自失者，圣人之心也。”如果能减少私心、欲望，从实际情况出发，节制对私欲和对名利的奢望，则可减轻不必要的思想负担，使人变得心地坦然，心情舒畅，从而促进身心健康。

③养心敛思。

养心，即保养心神；敛思，即专心致志，志向专一，排除杂念，驱逐烦恼。董仲舒认为，养气需要本身保持一种致虚守静的状态，安静地使精气到来，就能够使身心融洽宽敞并且长寿。他说“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形体无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形静志虚者，精气所趣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这与《医钞类编》的说法是一致的：“养心则神凝，神凝则气聚，气聚则神全，若日逐攘扰烦，神不守舍，则易衰老。”所谓凝神，即是心神集中专注一点，不散乱，不昏沉。可见，这种凝神敛思的养神方法，并非无知、无欲、无理想、无抱负，毫

无精神寄托的闲散空虚。因此，它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是绝然不同的。

从养生学角度而言，神贵凝而恶乱，思贵敛而恶散。凝神敛思是保持思想清静的良方。随着科学的发展，实验已证明，清静养神这种自我调节能保持神经系统不受外界精神因素干扰，使人体生理功能处于极佳状态。要想取得保养心神之良效，必须具备心地光明磊落，志有所专的品德。只有精神静谧，从容温和，排除杂念，专心致志，才能做到安静和调，心胸豁达，神清气和，乐观愉快，这样不仅有利于学习和工作，而且能使整体协调，生活规律，有利于健康长寿。

（四）物质养生：五行论——衣食住行性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取象比类学说，并非指五种元素，而是以木、火、土、金、水为标识，代表了世界万物的曲直、炎上、稼穡、从革、润下五种运动性质，万事万物分别归于其中的一类，广泛应用于哲学、占卜、算命、历法、中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是一种原始朴素的认识方法。

对于五行学说，在董仲舒之前，《尚书·洪范》《左传》《吕氏春秋》等作品中均有记述，但都没有进行系统的阐释。《春秋繁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五行论的思想内容，第一次提出了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的观点，成为后人五行理论应用、辩论的核心内容。董仲舒主要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人伦关系、政府机构设置、帝王行政等几个方面。对于如何养生，他也以五行理论进行了简略阐述。

1. 饮食做到“臭味取其胜”。

他先以五行与方位、四季相结合：水（北，冬）—木（东，

春) —火(南, 夏) —土(中, 季夏) —金(西, 秋)。他说: “故冬之水气, 东加于春而木生, 乘其泰也。春之生, 西至金而死, 厌于胜也。”冬天的作物(这儿指冬小麦), 到了春天, 正好遇到适宜的生长条件。春天种植的作物(主要指谷子), 到了秋天就会死去, 因为遇到了压迫它的环境条件。以此得出了结论: “生于木者, 至金而死; 生于金者, 至火而死。春之所生, 而不得过秋, 秋之所生, 不得过夏, 天之数也。”

接着, 他将这种理论应用到饮食养生中。他说: “饮食臭味, 每至一时, 亦有所胜, 有所不胜之理, 不可不察也。”意思是每一个季节都有适应其气候环境特征所需要的食物, 也有不适应其特征需要的食物。

具体的代表作物是: “荠以冬美, 而茶以夏成, 此可以见冬夏之所宜服矣。”他主要生活在长安一带, 这儿的荠菜冬天生长的最好, 夏天的茶菜长最好, 都是两他季节最宜食用食物, 也代表了这个季节的食物取向。因为根据五行理论: “冬, 水气也, 荠, 甘味也, 乘于水气而美者, 甘胜寒也。”“夏, 火气也, 茶, 苦味也。乘于火气而成者, 苦胜暑也。”冬天多吃甜味食品, 夏天多吃苦味食品。

根据他的气论哲学, 他认为“四时不同气, 气各有所宜”。四季运行, 每个季节都有利于生命成长的真气, 叫“生气”, 即不同的气适应不同的生物的成长。人的饮食应当适应这种天气, 与天道相向而行, 才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冬天是水湿之气最盛的季节, 荠菜是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中生长的植物, 适应冬气, 味道向甜, 所以冬天吃荠菜这种甜味食品,

可以达到御寒的效果，这是冬季养生的饮食方向。“夏，火气也；茶，苦味也。乘于火气而成者，苦胜暑也”²⁰。夏季火气旺盛，茶这种苦菜是适应夏季火气生长的植物，说明苦味可以抵御暑热的侵袭，所以，夏季要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

总的要求是“春秋杂物其和，冬夏代服其宜”²¹。春秋两季，气温适宜，阴阳平衡，万物生长成熟，应当掺杂食用各种味道的事物，冬季和夏季则食用本季节内适宜生长的食物，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到天地的正气，来滋养人的真元之气，即为“常得天地之美”²²。

相反，夏天，荠菜这类甜味物质不能生长，人就必须“尽远甘物”，不吃甘甜的东西。到冬天就不要吃苦味的东西。大体上说，什么季节生产什么东西，就吃这种新鲜的食物，就是顺应天道，即“违天不远矣”²³。就与天地的运行规则基本相一致了，这样可以益寿。

他以中和理论来选择食物，强调与季节的一致性，这种思想符合人类长期形成的习惯。冬天御寒，多吃含糖分、脂肪等能量较多的食物；夏天防暑，多吃瓜果蔬菜等能量较少的食物，是最普通的常理，也是最重要的养生方法。

在食量上，要做到“食欲常饥”。吃饭不要过饱。他说：“人的内脏太实，体内之气就不会通畅；内脏太虚，体气就不充足。生活在过热的环境中精气就消耗多，生活在过寒的环境中精气就郁积不通畅。过于劳累，气就难进入体内；太安逸，体内的气就阻

²⁰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²¹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²²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²³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滞不通畅。发怒时则气高扬，高兴时则气分散，忧愁时则气发狂，恐惧时则气沮丧”²⁴，这十种情况，都是损害人体真气的，不符合中和的原则，不利于养生健体。

2. 穿衣做到“衣欲常漂”。

他提出了穿衣方面的养生要求：“凡养生者，莫精于气，是故春袭葛……衣欲常漂”²⁵。

这儿的“葛”，即葛布。葛是多年生蔓草，其茎的纤维所制成的织物叫葛布，俗称“夏布”，质地细薄。以葛为布，自古有之。

《诗经·葛覃》提到：“葛之覃兮……是刈 yì 是濯 huò，为絺 chī 为绤 xì，服之无斃 yì。”即说：“葛藤多柔长……割来煮泡后，织成粗细布，穿试百不厌。”说明在先秦以前，人类用葛藤纤维进行纺织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自周以来，历代贡赋，尤以广东之葛为有名。其织葛者名细工，织成布薄如蝉翅，重仅数铢。明清以来有用丝纬葛经混织的工艺。至今，布朗族的服装纺织原料仍然有葛线麻，特别是双江县邦丙乡布朗族妇女善织葛布，远近闻名。布朗族传统纺织技艺被云南省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韩非子·五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史记·太史公自序》：“夏日葛衣，冬日鹿裘。”由于葛布质地细薄，透气性好，所以多用来用夏天的衣服。

衣服透气性与保暖性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指标。面料内的空气可以有一定流动性，以调节潮湿闷热。但同时又不能流动性太好，不然就会带走过多热量。夏天衣服的功用主要是用作遮羞和美观，

²⁴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²⁵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葛布来作夏衣，爽身适体，应是最好的选择。

衣服经常浣洗也是养生的要求，特别是贴身的衣服，更要经常换洗。因为皮肤的分泌物和汗液、皮屑、灰尘等同时混合附着在衣服纤维里，若不及时清除，可使衣服逐渐被酸化而变黄。特别是夏天，若被汗液浸渍的衣物不及时更换或清洗，就会造成霉菌滋生，从而导致人得花斑癣等疾病。

3.居住做到“居处就其和”²⁶。

董仲舒认为，居住环境应该体现“和”的要求。这种适宜的环境不偏阴不偏阳，不冷不热，不湿不燥。夏天居住在凉爽的地方，秋天要躲避肃杀之风，冬天避开过度潮湿的地方。

当时没有现代的冷暖设备，怎样才能做到“和”的要求呢？他认为应通过房屋的高低宽窄来调整，他说：“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圣人弗为，适中而已矣”²⁷。台子太高，阳多干燥；房间太大，阴多潮湿。这两种情况，一是偏阳，一是偏阴，都跟“天地之和”相违背。所以圣明的人都不会做这种选择。他们居住的房屋都要求“适中”，即不高不广，才能达到“天地之和”，有益于养生。

古人说：“屋大人少切莫住。”当一个人居住在一个宽敞的房子里，人的气就会被宽敞的房屋所损耗，一旦人气被损耗，各种疾病就会随之而来。因为，人睡觉的时候需要“聚气”，而不是象白天那样要“豁然开朗”。晚上睡觉要是把“气散了”，第二天会整个人都不好了。其实，这是符合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因为人在

²⁶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²⁷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适当空间会出现“幽闭”的感觉，很容易入睡，睡眠质量更高。现在我们的房间格局也是这样，客厅比较大，适合“高谈阔论”，而卧室则是私密空间，适当的面积就可以了。

古代帝王对于真正睡觉的地方也不会要求面积过大，也是很科学的。古代的皇帝高高在上，可以动用全国的资源为自己服务，锦衣玉食，广厦千万，但自己的卧房并不大。北京的故宫是世界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拥有房间 9000 余间，庞大而雄伟，而养心斋的卧房并不比普通百姓的卧房大多少，总共十几平米。并且卧房中的那张龙床也不比我们平常睡的双人床大，如果床前的那两道帘子再放下来的话，睡觉的空间就更小了，甚至还不到 10 平米。这样的小户型房子，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或许有些不相称。但是，从所有的寝宫来看，承德皇官、沈阳清故宫的寝室都十几平米，不是很大，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地位的尊卑就有所改变。

古今同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并非房子越大越好。面积太小也不行，空气不流通，宅气凝滞不畅，对身心都有害处。房屋的净高和进深要求，每个人的居住面积最少不能低于 6 平方米，否则，居住过分拥挤，使人的大脑皮层受到刺激，长期下去，会产生头晕、疲劳、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对健康极为不利。

4.行为做到“体欲常劳”²⁸。

董仲舒看到了运动对于养生的重要作用，他说：“体欲常劳，而无长逸居多也”，他主张身体要经常活动，不能长久地怠惰不动，更不能长期处于“逸居”的状态，而“常劳”则有利于生命的保养。

他说：“鹤之所以寿者，无宛气于中，是故食滞。猿之所以寿

²⁸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者，好引其末，是故气四越”²⁹。

鹤长寿的原因是体内真气流畅不郁，吃了食物不会滞留胀闷，所以身体轻盈敏捷。在鸟类中，鹤的确算是长寿的，有的能活到50至60岁。据说，人们从没见到过鹤的尸体，又加以体态飘逸雅致，舞姿优美动人，一直被作为长寿的象征。古人说“猴寿八百岁”。特别是猿猴，面似老人，四肢修长，身体灵动，善于攀援，真气通过肢体运行不息，被视为长寿的象征。

由鹤、猿长寿现象，他总结的规律是：“天气常下施于地，是故道者亦引气于足，天之气常动而不滞，是故道者亦不宛气。”“引气于足”，通过运动，把体内之气引向四肢，达到“动而不滞”的目的，生命质量自然就会提高。

从穴位学的理论讲，人体的阴阳之气通过任督二脉，从头顶的百会穴，到上肢手心的劳宫穴，到下肢足心的涌泉穴，相互贯通，就能达到强身祛疾、开慧增智、延年益寿效果。正如南怀瑾教授在《如何修正佛法》中讲“如果你两腿通气，你寿命可以增加几十年”，“待气行至足心，才能谈得上三脉七轮打通了”。

5.房室做到“不盛不合”

他说：“节欲顺行则伦得，以儻静为宅，以礼义为道则文德”³⁰。节制欲望、顺理而行就符合道德伦理，以安闲自适作为精神的住宅归宿，以礼义伦理作为行为的规则引导，这样的德行就是美好的，对身体保养和工作生活都是十分有益的。

养生要求节制情欲，而且，在情欲方面要体现“中和”的要求。

²⁹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⁰ 《春秋繁露·天道施》

他说“男女之法，法阴与阳”³¹。男女关系就是阴阳关系。按“中和”理论，阴阳“盛极而合”，“不盛不合”³²。人也是这样，要做到“养身以全”，“男子不坚牡不家室，阴不极盛不相接”³³。天地之气在运行的时候，先使阳刚雄性旺盛后方才施放出精气，这种精气质量稳固；地气使阴柔雌性旺盛后方才开始生育，所以生育良好。男女都要发育到身体最强盛时期才能结婚，才能达到“身精明难衰而坚固，寿考无忒”³⁴的目标。

男女什么年龄才是“盛极”状态，可以结婚了呢？董仲舒没说。根据《礼记》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男子 20 岁要行冠礼、女子 15 岁行笄礼，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成人礼，之后就是成人了，可以结婚生子。西汉惠帝更是下令女子十五岁就要出嫁，否则就得交五倍的税赋。这是统治者从增殖人口、增强国力角度出台的政策法令。但从人口再生产，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讲，是不科学的，达不到董仲舒所说的“化良”的效果。今天我们的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男子 22 岁、女子 20 岁，从身体和心理发育成熟度来看，是很科学的，对于优生优育、人口再生产，对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都是有益的。

董仲舒倡导秋冬迎婚的礼俗。他说：“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与阴俱近，与阳远也”³⁵。即，天道的运行规则是，趋向秋冬两季的时候，阴气到来，趋向春夏两季时，阴气就离去。所以，古代人在霜降以后，开始迎娶新妇，操办婚礼，到冰雪融化时就

³¹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²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³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⁴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⁵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停止这样的事情。秋冬迎婚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较为合理而且普遍民间礼俗。《诗经·氓》说：“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明确指出了以秋天作为婚期。这是与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规律相适应的。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生活，春夏人们忙于农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人力、物力来进行婚嫁这种耗费精力和财力的活动。秋天收获后，粮食丰收，家畜长成，时间空闲，有了物质基础，进行婚嫁之事最为适宜，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吻合的民俗习惯。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但已被现代化大生产冲淡了很多。

董仲舒认为婚后的“游房”也是必须注意的。他说：“君子甚爱气而游于房以体天也”³⁶。注重修养的人爱惜自己的身体精气，也是按照天地的运行规律来行房事。盛极而交，行房事也要遵循“中和”的理论原则。“气不伤于以盛通，而伤于不时、天摒”³⁷。人的精气不会因旺盛的时候相交而损伤，倒是会受到不适时、背离身体发育规律的相交而伤害。不与阴阳之气运行相配合的行动叫不适时，即“不时”；放纵自己的欲望，违背天理规则，会被上天所抛弃，即“天摒”。具体来说：“新牡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牡之日”³⁸。即，新婚夫妇十天游房一次，男子四十岁二十天一次，五十岁四十天一次，六十岁八十天一次，七十岁十个月一次。这种数量的规定并不是僵化的。他说“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于不极盛不相遇”³⁹。这种频次的要求仅仅是“大略”，精神实质在于“不极盛不

³⁶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⁷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⁸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³⁹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相遇”。总的要求是“疏春而旷夏”，春季行房事的次数要少于秋冬季节，夏季间隔时间要更长一些，这样就不违背天地的规律常道了。

这样看来，董仲舒是主张节欲的，而不是禁欲。这是他的中和之道在男女婚媾方面的应用，始终要保持精气的“盛极”状态，就是他所说的“中”，这对养生保身、优生优育和工作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房事有度，即是要控制数量问题。但“度”不是一个绝对概念。《素女经》认为：“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年三十者，八日一泄；年四十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二十一日一泄；年六十者，即当闭精，勿复更泄也。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凡人气力自相有强盛过人者，亦不可抑忍；久而不泄，致痲疽。若年过六十，而有数旬不得交接，意中平平者，可闭精勿泄也”。古人认为不同的季节，度的标准也不相同，应遵循“春二、夏三、秋一、冬无”的原则，即春天每月二次，夏天每月三次，秋天每月一次，冬天避免房事。孙思邈还指出：“人年四十以下，多有放恣”，若不加节制，“倍力行房，不过半年，精髓枯竭，唯向死近，少年极须慎之”。古人这些有关两性生活的观点，其中包含着合理的科学成分。

二、董子文化与党性修养

党性指的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治性、先进性、纯洁性、群众性、纪律性是党性的组成部分，增强党性就要在政治性、先进性、纯洁性、群众性、纪律性等方面进行不断学习提高，以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能力和素质。发扬善于继承传统文化优势，从董仲舒

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认识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对我们的党性修养是大有裨益的。

（一）社会历史观与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今天的我们有共同的民族追求，有中国梦，我们的古人也有他们的社会理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一文中，集中向世人描述了一个“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的大一统盛世景象：“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时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先之应也。”

这是董仲舒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在他的描述中，除去“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等神秘主义的想象成分外，整个社会的治理则达到了令人向往的境地，吏治严整、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万国来朝，轻徭薄赋、百姓晏安，教化大行、民风淳朴。在《天人三策》中，他向汉武帝阐释了“王道”治理下的社会状态：“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毕至”，“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⁴⁰。

这种社会理想来源于那个时代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及脉络的直观性认识，缺少科学的论证，带有很大的想象成分和个人愿望。依笔者来看，历史退化、复古改制、三统循环应是他历史思想的本质特征。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历史退化论观点。根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认为最美好的“大道之行”大同社会在远古时代，属于五帝之世；后来，由于“大道既隐”、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社会坠落到了小康状态，属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治理成果；再到后来，由于桀纣等人“骄溢妄行”，礼崩乐坏、天子失势、诸侯并起，则出现了混乱之世，即春秋时代。孔子无缘“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的时代，但他立志做一个象周公一样的人，努力恢复曾经的历史荣光。孔子极力推崇周公，他竟然期望能天天梦见周公，可见崇拜之深——“甚矣，吾衰也，久矣矣不复梦见周公”⁴¹。他的理想是恢复周公所治理的时代，就是夏商周“三代之英”社会治理。

董仲舒所描绘的生动美好社会图景也是“五帝三王之治天下”“古以大治”的古代社会，而他所处的社会则象孔子所说一样，是个混乱不堪的状态，他反复强调“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其遗毒余烈，至今未

40汉书·董仲舒传

41论语·述而

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一何不相逮之远也”，“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⁴²，等等，都说明在他的观念中，从古到今，是个日益衰败、不断退化的过程。

他想建立，或者说是恢复古代美好社会的方法是“奉天而法古”，他说“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⁴³，“《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⁴⁴。为什么要法先王呢？因为“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先王都是圣人，他们能观察天道、顺应天道来治理天下，“天道各以其类动，非圣人孰能明之”⁴⁵。“圣者法天，贤者法圣”，今天的“贤者”学习先王之法就是遵循天道行事，即“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在《又言限民名田》一文中，集中体现了他复古改制的政治思维，“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汉兴，循而未改”，可谓世风日下、今不如初。怎么办呢？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复古思想十分清晰。

董仲舒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社会理想追求，但每个人的表述各不相同，如孔子的“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

⁴²汉书·董仲舒传

⁴³汉书·董仲舒传

⁴⁴春秋繁露·楚庄王

⁴⁵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其核心内容是“天下为公”这四个字，被孙中山先生经常引用和书写，也表达了他的理想社会观。从“大同”的内容来看，与我们党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基本相同远景追求。而“小康”二字，“小康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作为阶段性战略构想而提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表述，与我们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也有本质的区别：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社会空想和历史退化认识上的社会观念，我们党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和长期实践基础上科学理论。从目前人类对社会发展轨迹规律的认识来看，根据人们的美好期望、科学论证，在能够预见到的未来，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是科学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是与空想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相对而言的，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正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建立起了一套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高成果，是激励我们共产党人奋斗追求的美好愿景。

董仲舒在追求理想过程中遇难而退的人生选择与我们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相差甚远。董仲舒的仕途一波三折，并不顺利。从他的经历来看，“凡相两国，辄事骄王”。当时的丞相公

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弘嫉之”⁴⁶，因此向汉武帝建议“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让董仲舒担任在刀尖上跳舞的职务。因为胶西王是个“纵恣”之人，杀害了多位相国，但董仲舒以“义不讪上，智不危身”⁴⁷的过人智慧，保全了自己。在《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一文中，可以体会到他向权贵低头又无可奈何的心境，感叹“屈意从人，悲吾族矣。”⁴⁸。汉武帝建元六年，因《庙殿火灾对》一事，把董仲舒交官问罪，判处死刑，汉武帝念他忠心为国，人才难得，就下诏赦免了他。最后，“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⁴⁹

晚年写了《士不遇赋》一文，表达了他的一生不遇的悲慨之情，他以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样的圣贤为榜样，又悲愤“使彼圣贤其繇周遑”的遭际。他说“出门则不可与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感叹“天下之偕违兮，怅无与之偕返”，自己决心“返身於素业兮，莫随世而输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种高级精神活动，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我们党百年历史来看，不管是“夏明翰”，还是“后来人”，历经坎坷和磨难，多次面临生死存亡和严峻的考验，但初心不改，使命如山。在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使中国共产党丧失大批领导干部和优秀党员。党面临着诞生以来首次生死存亡的抉择。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党和红军进行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再次

⁴⁶汉书·董仲舒传

⁴⁷春秋繁露·楚庄王

⁴⁸士不遇赋

⁴⁹汉书·董仲舒传

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文革”时期，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扰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给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严重的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发扬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越挫越勇，历久弥坚，不断成熟和壮大起来，从一个只有 50 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 9000 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之路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中国共产党成功的背后熔铸着百折不挠的精神。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执着信念。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不仅靠党旗前的宣誓、靠纪律规矩约束，还要靠不断学习、研究、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面对现实、分析问题，不断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将自己打造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现状极其复杂的条件下，作为一名党员，只要不生活在真空中，就会时常面临理想信念的拷问，面临信与不信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二）独尊儒术与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

夏商以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的观念已广泛传布，秦汉时期，建立巩固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要求日益强烈。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大一统观念虽植根于天地自然，滋生于世道人心，代表了东方族群的整体利益，是历代哲人志士的理想追求，但由于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民族居处的个性差异和独立性、排他性，要在社会治理中变为现实，需要统治者有意识地进行培养和努力，董仲舒给出了他的治世方案，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被统治者收采纳，应用于社会实践，起到了“一言兴邦”的治理效果。

首先，独尊儒学，统一思想。思想是现实的反映，思想的多元性必然导致政治的多元性。独尊儒术是董仲舒用以建立和巩固大一统社会的远见卓识。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他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⁵⁰。董仲舒以敏锐深邃的历史视角来观察当时的社会治理情况，提出，没有统一的思想，就没有统一的行为，不能为百姓的日常行为准则提供法度支持，就不能巩固政治的大一统局面，他主张，取孔子的学说、六艺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来整合、建构汉朝的国家意识。

其次，儒学立教，培养人才。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兴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教育学生，并作为政府的法典，指导政治活动。在中央“立大学以教于国”的同时，在地方“设痒序以化于邑”，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逐步实现了思想的统一。

⁵⁰汉书·董仲舒传

第三，广选人材，量能授官。董仲舒的方法是：部分官员来自太学生，经过数次考试策问，“则英俊宜可得”；另一部分是官员推荐的儒生。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受过儒家教育的人，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既提高了官吏的素质，也保证了思想的统一性。

“独尊儒术”使儒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加强了君权，稳固了政权，统治者的政策措施更容易推行，更容易见效，之后的历代王朝都延续了这种统治方法与治国策略，带来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独尊儒术”，今天我们共产党人称之为统一思想、思想建设。对于任何组织（集团）而言，广大组织成员在关键问题、重大事项上只有认识相对一致、意志相对集中，这个组织才能步调一致、坚强有力。特别是现代政党组织更需如此。正如 1953 年毛泽东所言：“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同样的中国人民，一旦组织起来，外御强敌，内兴产业，走向富强；没有组织起来时，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百业凋敝，积贫积弱，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其他如组织、方法、工具等层面的问题都好办了，思想不统一，其他都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十分注重统一全党思想，我们今天称之为“看齐”意识，这是维护中央权威、服务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前提。

1. 统一思想的哲学根据。

我国是一个有 13 亿多人口、56 个民族的大国，我们党有 9000 万党员、400 多万个党组织，靠什么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对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

种文化相互交融、各种观念相互碰撞，是当今时代的特征。用一种思想观念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实在没有必要，也是不现实的。”也有人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扩展了人们选择的空间，但人们的选择都是受一定的价值观主导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我们的社会就会陷入无序或混乱。”

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基础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哲学基点。关于宇宙本原问题，董仲舒提出了“元”的概念。他说：“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又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元”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宇宙“正”的顺序中，“元”又是在最前列。这些说明，在董仲舒的心目中，“元”是宇宙的终极本原。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以“一元”来统一矫正，所以“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在他的认识中，圣人生而知之，受天命而治天下，他的理论已经充分完全的概括描述了天地的本源，所以用圣人的理论来统一人的思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唯物主义一元论中，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一元论才科学地论证和全面地贯彻了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的观点。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一种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与对象相符合的，这就是真理性认识。这同时就意味着关于同一对象的其他认识是与对象不相符合的，因而不是真理，而是谬误。互相对立的认识不能同为真理，所以真理只有一个。毛泽东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一元论最简明的表达和论证。这也是我们统一思想的哲学基础。

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关于真理多元的观点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实用论，他们把真理当成了一种工具，对自己有用的有利的就是真理，用杜威的话说“真理即功效”。从这个基点出发，只能得出真理是多元的观点。这是资本唯利是图、为我所用的真实反映。绝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更不是广大民众的意志反映。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思想正确与否，会在实践中导致不同的结果。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被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自觉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历史前进。

在社会实践中，思想多元化带来的社会混乱和动荡给了我们深刻的借鉴和教训。从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变，再到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冬，都是从思想多元化开始的。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造成了后果。近几年香港的社会乱象，更是由于思想的不统一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当今世界，美国搞乱一个国家的基本方法就是在舆论上制造思想多元化认识，这是所有进行颜色革命国家的深刻教训。

2.统一思想的实现方法。

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这里的“基础”揭示了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功能定位。基础是一切之根之基。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第一步，对于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来说具有夯基垒台、强基固本的作用。思想具有先导作用，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作指导，党就会制定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武装头脑，党员就会有怎样的行动。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可以说，思想建设的基础没打牢，党的其他各方面建设就不可能巩固，党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通过思想理论建设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自觉地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并与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相结合，全面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百年的实践中，我们形成了成熟的方法和途径，这些基本东西不能丢。同时，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方式和方法，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坚持求实、创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增强思想理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实践，科学设置思想理论建设内容，扎实生动地开展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努力提高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弄清“入党为什么、执政干什么、身后留什么”，切实解决宗旨意识淡薄的问题。

要采取广大党员干部喜闻乐见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形式，把灌输教育、典型教育、形象教育、对比教育、现场教育、与进党校培训、举办学习班、辅导讲座、党的生活会、理论研讨会、报告会、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参观访问、电化教育等形式紧密结合起来。

利用广播、电视、党报、党刊、党政网络等大众媒体，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高度重视互联网的作用，探索带规律性的东西，加大正面宣传，使互联网成为思想理论建设的新阵地。同时还要注意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教育学、美学等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提高思想理论建设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

要及时总结推广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新鲜经验，宣传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先进人物，讴歌他们献身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的事迹。要经常召开党员干部思想理论分析会，增强思想理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交流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经验和方法，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新途径、新路子。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民共识。

在全而深化改革的关键节点上，必须高度重视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在关键的历史时期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经验。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节点上，要始终把巩固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为，一方面，现在的各项改革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和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改革的推进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特别是某

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利益藩篱，从而使得党内对推进各项改革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思想认识，就像习近平所说，“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在这样的情势下，唯有不断统一全党思想，最大限度凝聚全党改革共识，才能进一步坚定全党改革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才能有效克服利益的掣肘，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威力和效力。另一方面，当前社会思潮多元多变多样，各种思想交流交融交锋倾向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站在推动各项事业前进的最前沿，这些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必然会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党员干部中来，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产生影响。这又进一步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内教育和舆论引导，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

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全党。我们党统一全党思想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当前，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根本要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最新成果来武装全党，统一全党思想，以思想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来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形成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

（三）民本思想与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

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上就形成了“民

为邦本、本固邦宁”⁵¹治理观念，“民本”“重民”的思想十分丰富。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讲得更为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董仲舒则把“民本”“民贵”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了“为民”“安民”“乐民”的层次，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⁵²。

一是政权的基础是民众。董仲舒也是先秦以来名实理论继承者和杰出代表人物，他在探讨概念（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方面做出了贡献，他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事物的名称代表了他的真实含意，如果不真实的话，人们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个名称。据此，他对“王”和“君”进行了解读：“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⁵³。所谓王，就是人民归往的意思；所谓君，就是不会失去他的群众的意思。因此，能够使万千民众归向，并得到天下群众拥护的人，天下就没人能和他抗衡了。如果相反，“赋敛无度，以夺民财；多发徭役，以夺民时；作事无极，以夺民力”。“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⁵⁴。得不到民众的人，也得不到政权。

二是政权的治理靠民众。董仲舒很强调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作用。他说：“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⁵⁵。治理国家的政策教化没有比崇尚根本更重要的了。什么是根本呢？他说“天、地、

⁵¹ 《尚书·五子之歌》

⁵² 《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⁵³ 《春秋繁露·灭国篇上》

⁵⁴ 《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⁵⁵ 《春秋繁露·立元神》

人，万物之本也”⁵⁶。遵循天道规律，注重地力耕织，以礼乐教化安抚百姓，这样政权就会稳固长久。相反，如果不这样做，君王就会处于没人威胁而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没有人要消灭他却自己灭亡了。他说桀、纣这些失去民众的无道之君，“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⁵⁷。“桀，天下之残贼也”⁵⁸。对于这些没有民众支持的“独夫”“一夫之人”，应该加以讨伐，“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他的依靠民众、反对暴政的思想，是夏商以来民本思想的继承。

三是政权的运行为民众。董仲舒从“天立王，以为民”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德治思想。人君要有一爱民之心。他说：“《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⁵⁹。并说“仁者，爱人之名也”。爱民就不能“苦民”、“伤民”、“杀民”。董仲舒说：“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⁶⁰在董仲舒看来，凶年修旧，对老百姓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是《春秋》所忌讳的。致于“伤民”、“杀民”，则更要严加禁止。董仲舒甚至把害民之大小作为量政治上恶之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认为“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⁶¹。董仲舒从其阴阳五行观出发，认为“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从而进一步向统治者出了要依天道实行仁政德治，化育百姓，做到“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⁶²的主张，反对封建国家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孟子曾经为制民之产立了一条基

⁵⁶ 《春秋繁露·立元神》

⁵⁷ 《春秋繁露·仁义法》

⁵⁸ 《春秋繁露·暖燠常多》

⁵⁹ 《春秋繁露·仁义法》

⁶⁰ 《春秋繁露·竹林》

⁶¹ 《春秋繁露·竹林》

⁶² 《董仲舒文集·又言限民名田》

本的标准，就是要让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⁶³。董仲舒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提出了要使老百姓“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⁶⁴的主张。针对汉武帝大兴徭役、兵役，老百姓苦不堪言的状况，董仲舒率劝统治者要“省後役”，并以阴阳五行观点论证统治者顺应四时规律，注意与民休息和不违农时的重要性。

董仲舒是个有远见的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论述，代表了古代士大夫阶层体察民情、关心民众政治倾向，因而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重民惠民的政策主要是当作统治手段的，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广大人民的真实利益出发。所以一旦他们的统治巩固了，或者只顾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横征暴敛，盘剥百姓，以致最后自取灭亡。而中国共产党则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为政者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不再有阶级的利益冲突，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而成了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和出发点，发展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思想：党的一切政策和领导工作、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言论行为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始终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对今天的社会治理来说，传统民本思想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基础性的社会理念。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⁶³ 《董仲舒文集·又言限民名田》

⁶⁴ 《董仲舒文集·又言限民名田》

中国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不仅传递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而且在社会出现矛盾时，能够适时地起到调节作用。“民贵君轻”、“君权民与”等观念基于保护民众权益，曾经制约了君主专制，今天也在思想上限制了各级党政干部私心私欲的过度膨胀，引导了权力的运用和社会价值的发挥，我们今天称之为“权为民所用”。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绝不以权谋私。传统民本思想所倡导的“制民之产”对人民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尤其可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能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今天称之为“利为民所谋”。各级党员干部以正确的利益观，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心为人民谋利益。传统民本思想所推崇的爱民、亲民、利民、顺民主张有利于维护政局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今天称之为“情为民所系”。在实施社会治理过程中，坚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绝不脱离群众。传统民本思想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助于提高个人道德水准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传统民本思想为“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念提供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郑燮的一句诗“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以民为本、宽政于民、悲天悯人的思想意识。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

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血脉在人民。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财富，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在文化血脉中，在社会实践中，传统的文化土壤是我党治国理念的深厚而广大的基础。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民本思想能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融合，主要集中在“民贵君轻”思想与“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二者已经逐渐融合，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不断创新出新的成果。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我们在各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但社会上依然存在诸如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潮。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再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治国理念强调回归初心，从历史中寻归党的初心，从传统文化中强化党的使命，“不畏浮云遮望眼”，信心如初坚如磐。

传统民本思想为当前执政党建设提供价值归属。当前执政党的政治核心在于如何获取民心。获取民心必须以顺应民心作为基础，即“顺民得民”，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富民利民”政策。新时期，富民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让群众得到真切的实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走共同

富裕道路就是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利民就是要结合实际，加快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养老服务等体系的建设，实现学有优教、劳有丰酬、病有良医、老有颐养。党的建设要始终坚持富民利民的原则，始终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传统民本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和社会遗产，弥足珍贵，发扬光大。

（四）仁义观与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

仁、义，是儒家的重要哲学范畴，其本意为仁爱与正义，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是中国政治标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价值判断，其内涵和外延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地增益创新。《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董仲舒系统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仁义思想，对仁、义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仁义的法则是治世所要遵循的根本道德原则和最高法则，对仁义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董仲舒否定只爱自身的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既简括，又通俗，所以比较流行。董仲舒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和发展。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又说：“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这儿他表述得非常清晰，仁就是指爱别人。不爱别人，只爱自己，不能算“仁”。他举了一个例子：

春秋时代，有一个这样的诸侯王叫晋灵公。他让诸位大夫都去拜见他，他在台上，用弹丸弹射他们。诸位大夫跑来跑去躲避弹丸，晋灵公觉得很开心。晋灵公以弹射大夫来取乐，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很不得人心。另外，晋灵公在物质享受方面也是很讲

究的，别的不必说，难得的熊掌也能吃上。有一个厨师给晋灵公煮熊掌。熊掌是比较难熟的，要煮很长时间，而晋灵公口馋得很，等不及，把尚未煮熟的熊掌取出来吃。一吃发现不熟，晋灵公一气之下，就把厨师杀了，非常残忍地肢解以后放在簸箕中，让别人抬走。董仲舒对晋灵公作出这样的评论：“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然而不得为淑人者，不爱人也。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

其次，否定了“亲亲为大”的原则。仁者所爱的人不是自身，而是别人。别人指什么人呢？先秦儒家提出了“亲亲为大”的原则，就是说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包括父母妻子兄弟等人，由此逐步扩大，爱与自己比较亲近、多少有些关系的那一小圈子的人，最后才能说到人民，这就是“爱有等差”。董仲舒不同意“亲亲为大”的原则，他在《五行相胜》中讲了这么一个事例：

（营荡）为齐司寇。大公封于齐，问焉以治国之要，营荡对曰：“任仁义而已。”太公曰：“任仁义奈何？”营荡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太公曰：“爱人尊老，奈何？”营荡对曰：“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义治齐，今子以仁义乱齐，寡人立而诛之，以定齐国。”

这个故事不见于其他古籍。营荡爱的是儿子，尊的是妻子，爱是不食其力的溺爱，自己不劳动，靠别人养活，尊是跪拜形式而已。“仁义”在营荡那里还是坚持以“亲亲为大”的原则。这个故事，以太公为正确的代表，诛营荡以定齐国，表达了冲破“亲亲为大”旧观念的强烈愿望。董仲舒讲述这个故事也表明对待仁义的理解和对亲亲原则的批评态度。

第三，把爱民、救民作为仁的最高原则。

在空间上，做到“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爱的范围越广越好。“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爱天下之人，也就是爱人类，这是王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不能爱四夷而能爱其他诸侯，是霸者。只爱自己封地内的人，可以维持安定，这是受封的诸侯、卿、大夫。如果爱只及周围的人，主要是自己的亲属，那是危险的。如果只爱自己，那就会很快灭亡，象梁君、秦二世那样。这种观念是宗族体系逐渐松弛，由宗法社会向民众社会转变的思想体现。西汉统一中国后，刚刚脱离战乱的社会需要稳定，需要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天下为公”的政治格局。时代要求最高统治者皇帝首先要摆脱宗法思想的局限，跳出家族的小圈子，面向天下，实行“爱及四夷”的王道政治。

在时间上，他说，如果能够在祸害发生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使祸害消灭于萌芽状态，那就不会发生祸害。这样，全天下就都没有祸害了。这样必须做到“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观察事物的变化，预先觉察其变化苗头，在祸害发生之前就予以杜绝，这是爱民的最高水平，是对当政者智力的要求。

在儒家思想中，“义”的解释有很多种，凡是符合仁礼忠信恕的行为和道德规范都称之为“义”，泛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在儒家学者看来是正确的、符合道德规范的一切伦理准则。

董仲舒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意思是说，义，就是自己做应该

做的事，我做了合适的事，这样才可以称之为义。所以说，义是将自我与做合适的事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词，即：我+宜=义。简单理解就是，一个人做了合适的事情，就符合义的要求。这各解释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指向，依然是各有各的理解，不能统一。

董仲舒的解释比较符合“义”字的原始含意。“义”繁体写作“義”，从“羊”从“戈”从“手”。羊是古代重要的衣食之源，象征着财富。以手持戈，守护本人或本集团的财富，这就是“義”。这个概念，至今仍在使用。守护自己的财富可以从物质层面扩展到精神层面，都是要求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符合“义”的要求。

首先，端正自己。他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虽然也讲义是正，但不是正别人，正人民，而是正自己，正我。又说：“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就是说，义要求用封建伦理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为了纠正别人。如果自己行为不端正，虽然能够整治别人，也不能认为是符合义的。例如楚灵王带兵进入陈国，“灭人之国，执人之罪人，杀人之贼，葬人之君”，做了一些合乎义的事情，由于楚灵王自身不正，“托讨贼行义”（《公羊传》昭公九年及何休注）之名，灭了人家的国家，使陈国臣民大失所望。所以，楚灵王不能算行义的人。

其次，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怎样才能做到义呢？董仲舒认为首先是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要主动地揭露自己的错误，做到“自称其恶”。对于小错误，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不提，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要揭露出来，并加以批判。这叫做“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对己严，对人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董仲舒说：“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只批判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过错。

这样就容易理解董仲舒“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阐释了。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正人先正己，自己先把事做对了，再要求别人。这一点与孔子“修己以安人”的思想完全一致，表达了儒家在道德伦理观上“严于责己、宽于责人”的道德规范。针对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合乎义的规范，董仲舒说：“夫我无之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谓义？”他认为人生最可贵的是义，然而倘若只用义来要求别人，而自己不行义之事，这本身就是不可取的，要不断地审视自己、反省自己，用义来修养自我、培养品德、陶冶情操。

第三，仁义关系。仁、义两个概念往往是对称的，董仲舒在《仁义法》中，以对比的形式，论述了仁义之分：

一、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二、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三、仁谓往，义谓来。

四、仁大远，义大近。

五、仁主人，义主我。

六、仁者，人也；义者，我也。

七、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

以上各条说明同一思想：仁是对待别人要施以爱心，要宽厚；义是对待自己要正当，要严格。董仲舒认为仁义的这种分别是不容混淆的，更不应该颠倒。因此，他总结说：“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

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

这段话是董仲舒关于仁义的新思想的系统论述。他认为仁义所针对的对象是千万颠倒不得的，如果颠倒了，那就要带来暴乱，后果是严重的。他说：仁义差别，不可不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又说：“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二端之政，诡于上而僻行之，则诽于下。”这里的“众人”，指过去许多统治者。他们没有分清仁义的界线，用宽厚待人的仁来对待自己，使自己宽裕舒适；却用严以律己的义去要求别人，设法卡住别人。这样自然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董仲舒认为，乱世之所以经常出现，大概都是由于统治者“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

董仲舒的仁义论是古代士大夫阶层修养身心的道德要求，其核心内容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省自励、自我革新，如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强调通过学习，格物致知，端正自己的思想信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志、知识等修养，用先人圣贤的价值标准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是董仲舒人性论——“性有善质而未可谓善”的实践应用。努力向内心寻求，“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不对人进行教育，不启发他反省自己、自我解剖，那么，人本有的“善”性就会受社会邪恶的影响而变恶。

这种克己修身的思想，对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有深刻影响，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传统。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内省”思想的扬弃。所谓自我批评，

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反省，就是自己自觉地时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不仅仅是“内省”，而且还依靠集体，依靠组织的帮助，每个党员都是他人自省时可相对照的镜子。要加强党性修养，不仅要开展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批评别人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互相监督。今天我们称之为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

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自我革命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有效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成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经验。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能够有效防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变质变色，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物始终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它也是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辩证逻辑，即自我革命的逻辑或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运动，内在蕴含着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不断趋向人类解放，这同时

也是自我革命的过程。在《资本论》的跋文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段话揭示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实质，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思维方式。

这也可以用熵增熵减规律来解释。熵增熵减规律是物理学原理，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物理学中，熵代表一个系统的能量混乱程度，熵在增加，所以混乱程度越大。比如一个教室里面，没有老师，同学们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很舒服，但是随着熵的增加，刚开始会很舒服，到了最后是一片混乱，各自为政，学习漫目的，效率越来越低，慢慢的失去了方向。反之，熵在减少，则越来越走向秩序和活力。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政党也是如此。如果不从外部输入新鲜血液，不引进新的人员，不吸收新的思想，不革除弊端，长期停滞，就会变得僵化，内部矛盾、摩擦越来越多，最后就走向灭亡。董仲舒称之为“自称其恶”“义在正我”，这就是我们的自我革命精神。不实行自我革命，就会被革命、被替代。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中，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党的十八大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腐败、开新局，我们探索形成了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成功方法。

一是自我净化。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

毒瘤。每个共产党人都要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意识和能力，经常解剖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受到非主流思想的影响，时刻检视自己的思想、道德、作风是否受到不良风气的污染。同时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让自律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共为。

二是自我完善。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肌体、健全体魄、丰富功能，让自身更加成熟坚定。作为党员干部，要时常检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学深悟透，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是否落实到位，对党章党规的要求是否还存在不足，对距离群众期待的典型榜样是否还有差距。要做在理论修养上要“精”，在政治修养上要“强”，在道德修养上要“高”，在纪律修养上要“严”，每天对照先进找差距，补短板，积少成多，日清日新。

三是自我革新。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要开阔思维，更新自我，敢于破除各种落后观念和陈旧思维模式的束缚，积极捕捉和吸纳反映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新信息新思想，勇于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总结新经验、开拓新境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

四要自我提高。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新境界。“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只有不断学习，充实新知识、新技能，才能完善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切实增强工作预见性、系统性和创造性。同时要有埋头苦干、精益求精，

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精神，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善于从基层实践中寻找对策、汲取智慧。以永不自满、永不停滞的精神状态，不断地充实自我、提高自我、超越自我，不断地站在新的起点上，让自己更有价值更有力量更有作为。

（五）义利观与共产党人的格局境界修养

义利之辨，是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思考与辩论，几千年来争纷不休，论题逐步扩展，内容不断赋新，广泛应用于个人修养和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董仲舒继承孔孟思想，对“义利”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1. 义利天生，义利两养。

在儒家思想中，“义”的解释有很多种，凡是符合仁礼忠信恕的行为和道德规范都称之为“义”，泛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在儒家学者看来是正确的、符合道德规范的一切伦理准则。

董仲舒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意思是说，义，就是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我做了合适的事，这样才可以称之为义。所以说，义是将自我与做合适的事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词，即：我+宜=义。简单理解就是，一个人做了合适的事情，就符合义的要求。这各解释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指向，依然是各有各的理解，不能统一。

董仲舒的解释比较符合“义”字的原始含意。“义”繁体写作“義”，从“羊”从“戈”从“手”。羊是古代重要的衣食之源，象征着财富。以手持戈，守护本人或本集团的财富，这就是“義”。这个概念，至今仍在使用。守护自己的财富可以从物质层面扩展到精神层面，都是要求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符合“义”的要求。

董仲舒对“利”阐述是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他继承了春秋以来的名实观念，非常注重文字、概念的本意内涵，还专门写了《深察名号》一文，“诘其名实，观其离合”，提出“名生于真”“名者所以别物也”的主张。他对“利”的认识也是从文字的本意开始的。“利”，从“禾”从“刀”，用刀收割庄稼，既指刀的锋利，也表示创造财富。

董仲舒依据义利产生的根源，看到了物质利益同道德仁义一样对人生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义、利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之所以产生，上合天理（自然规律）、下合人情（本能需要）。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义和利，人人生而自有。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利益，人们无法生存，这即是“利”。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生活的，必需结成一定的群体，组成社会，一齐生活，这是由于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决定的。所以，人们在获取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照顾他人的利益，有的时候为了群体生活更好一些，会牺牲某些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都无法生存下去，这就是“义”。

进而，他说：“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董仲舒认为义与利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用，义是用来自我完善的，是人的精神需要，利是满足百姓的物质需求的，两者都不能缺失，都是必要的存在。

天人关系是董仲舒全部理论的基点，他的义利观也源自于这一理论。他认为，上天对人，有养育和满足人类需要的恩赐，“生育养人，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者民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见也”。圣人根据天的意志代天治民，对于民

众应当有兼利之举，“古人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只有“足之”“利之”，方能使民众“体”有所养，从而“义”有所托，教有所成。

人的生活需要物质条件的满足，物质匮乏就容易生乱，所以要用利来维护。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体莫贵于心”，即人的精神需求要远远高于物质需求，因此要以义养心，使人们精神充沛，生活舒心。人没有道义指引生活就不会快乐，没有物质利益的合理满足就无法生存。由此他肯定了义与利对人的实际作用，他坚持若把利放在义的前面，就会形成重利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社会就会失之稳定，甚至可能改朝换代。然而一定的物质利益是人得以生存的客观条件，只讲义，不讲利，百姓是无以生存的。因而应当义利兼顾，义利两养。

2. 义重于利，阶级有别。

首先，义重于利。他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中阐述了义重于利的观点。他说：“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人若只为自我生存、只为一己私利的话，就是如若动物一般的生存，和鸟兽无异，这也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现实中的人，更注重道义的价值，这是人的社会本质决定的。董仲舒反复强调人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的精神追求，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人的本质在于对“仁义”的追求，“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在《天人三策》中，他有一段论述：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

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圉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这段论述与马克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极为相似，也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概括和总结，是对道义本质、表现、价值的明确阐释，也是他的教化思想认识依据。

对于精神与身体的关系问题，董仲舒从生理和社会两个方面论证了人的精神高于人的身体两点。他说“（人的生命之）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之谓意，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少，气少者难久矣。”要保持健康的身体，首先保养人的精神世界，“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他特别强调，精神的强大可以克服物质方面的不足，“神无离形，而气多内充，而忍饥寒也”。

从社会层面来说，董仲舒以公元前 589 年，晋齐鞍之战中，齐顷公和他的大臣逢丑父的表现进行了说明。此战由齐国错误挑衅引起，而齐国大败，齐顷公被晋军追逼，“三周华不注”，差点被俘，幸得大臣逢丑父相救，二人互换衣服，齐顷公假装到山脚华泉取水，得以逃走。董仲舒迂腐地认为，齐顷公伪装逃跑的做法不符合国君、国家的大义要求，是对国家和君主都是一种侮辱，

“《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国灭，君死之，正也”。大臣逢丑父虽然救了国君，但也不懂臣子之义，“是为辱宗庙于齐”，让齐国受到了侮辱。因为他假装自己是国君，做了晋国的俘虏，在那个时代“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所以“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是应当谴责的。正确的做法是“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他认为，齐顷公应当像曾子说的那样：“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这是《春秋》一书所推崇的义利原则，也为董仲舒所接受。我们今天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战争的最高道义是保存生命，生命存在，可以转败为胜，可以东山再起。

董仲舒得出了他的结论，他说“体莫贵于心”，所以“养莫重于义”。既然人的“心”贵于“体”，那么养心之义就要贵于养体之利，“义之养生人大于利”。他列举了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闵子骞等人，说他们“有大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生活虽然困难，心情却是愉快的。相反，有另一些人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甚有利而大无义”，物质生活虽然丰富，精神却是空虚的。他们由于干的坏事多，或者死于犯罪，或者死于忧愁，都不能快乐地活到老。董仲舒经过以上论证以后，得出结论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义对于人的生活比物质财富更为重要。

其次，限私利、倡公利。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分，并且公利大于私利，因此公利被他提升到“义”的高度来认识。维护天下之公利，为公利作贡献，为公利牺牲，这是符

合儒家“义”的原则和要求的。所以，他积极倡导为民兴利的大义之举：“量势立权，因势制义，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尤春气之生草。”（《考功名》）可见在他的理论中，公利总是和“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倡为国家建功立业，大兴天下之公利。

私利也有两种，即食禄者的私利和老百姓的私利。在这两种私利中，董仲舒的基本主张是抑制食禄者的私利，保障老百姓的私利。

董仲舒坚决反对食禄者与民争利的做法：“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这实质就是反对他们追逐自己的私利。董仲舒提出“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和“盐铁皆归于民”等政策主张，目的就是要保有人民的私利。董仲舒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统治阶级可以一边谋取利益、一边讲仁义，而老百姓没有讲仁义的脑子和口才，他们不谋利则不能生存。老百姓不能生存，统治阶级就会失去生存的基础，也不可能生存。尽管教化是儒家行义的大事，但董仲舒仍主张先“饮之食之”，而后“教之诲之”，他认为“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如果不保证老百姓的私利，那教化也是无法实行的。如果老百姓对私利不加以关心，那君主、食禄者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效了，正所谓“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保位权》）。

在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公利、私利区分，在于维护天下之公利是符合儒家“义”的原则和要求。董仲舒认为人们追求利益是人之常情，要一定程度的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保障百姓追求

合乎义的情况下的利的权利，只有注重百姓的基本利益，才能使他们忠于君王，天下才能得以太平。因而他提出限民名田、薄赋敛、省摇役、什一之税、盐铁皆归于民等一系列利民的主张。他看到了政权存在的基础是民众基本利益得到保障，百姓的公利没有保障，就会“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走上犯罪的极端，社会就会有失太平，所以要以教化来引导和规范百姓的求利行为。

董仲舒特别主张，对于官员而言，要抑富济贫，限制他们的私欲。他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以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汉书·董仲舒传》）他指出有四条腿的动物就没有翅膀，有翅膀的动物就只有两条腿。有锋利牙齿的就不再长角，长角的就没有锋利牙齿。天地万物不能两方面都占有，因而人自然也不能获得双份利益。即朝廷那些食俸禄的官员，已经获得了大的利益，就不能再去经营工商业了，否则就是在与民争利了。董仲舒还举公仪休“拔葵出妻”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自身也是一生没有置办自己的产业，起到了很好地示范作用。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获取小利，这与天对动物的安排也是一样的。

他提倡的奖惩制度中，奖励于民有功的官员，惩罚谋私利而危害百姓利益的官员，以此得以兼利天下，保障民众的利益。这样就使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得到各自与之相应的适度的利，也不会因分利不公而导致社会动乱了。经过董仲舒这一调均措施，利和义分布合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减轻，因而天下得以平稳安

定。如果不进行调均，贫富差距就会愈来愈大，国家就难以治理了。因而，在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调均就是义的举措。在这一点上，合于度制也是董仲舒义利两养、义重于利的义利观的鲜明体现。而且他的义利观虽然没有否定利，但始终是将义放在首位，利居于其次的，他的义利观思想是重义轻利的。

他说：“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即对受教育者利的欲求，应予以满足，但将“欲”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培养人民敦朴之义，但又不以义灭欲。他认可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但是为了防止追利忘义遭到天的惩罚，并且危害自身而步入邪端，他指出应以仁义来加以防范，来规范人的行为。

第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对人们伦理道德的要求，应该先按一般公民标准，对某些阶层的人可以再提高标准。要求自己 and 对待别人也应该有区别，最好的风范是“待人也宽、责己也严”。站在从政治民的位置上、立志高远者，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应该高标准，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

董仲舒对“仁人”的要求，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两千年来被广泛推崇，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这句话的出处是：

董仲舒为汉武帝所赏识，被任命为江都相，服事易王。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素骄，好勇”，全靠董仲舒“以礼谊(义)匡正”。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那次，易王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与大夫泻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

以为越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对董仲舒以攻伐之事相询，以辅佐称霸之任相托，可以说此时易王心中是有谋反作乱思想苗头的。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诸侯王起兵叛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祸、痛苦。这不符合董仲舒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对个人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董仲舒防微杜渐，治病救人，所答对的一番话就是针对易王的妄念、错误而作劝戒的。他引用春秋时圣贤柳下惠所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的话，告诫易王道：“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越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这句话，非泛泛之论，而是有其特定的针对性的。仁人君子只讲求道义（谊），不图谋功利；董仲舒这句话，有鉴于“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因而以对“仁人”品行的赞美，希望消除易王心中好勇作乱的思想苗头，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

这句话即使扩展开来讲，也只能是针对统治者、各级官吏，告诫他们不要贪功名图自利，以私心邪念来滋事搅事、祸国殃民；而应该立足于道义，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安定幸福为归依。因此，董仲舒这句话非但不“疏阔”、“迂腐”，而且很有教育意义、富有现实意义。至于后来一些人将董仲舒这句话到处套用，用之于要求劳动者、一般人，因而导致谬误；那只能怪后来人断章取义“读死书”，然后又以讹传讹、人云亦云；那是后来人的错误，不能将这个错误也推到董仲舒头上。

这一主张是源于儒家的等级伦理思想和义利分归的理论。虽然儒家主张教化百姓，让他们也懂得一点“义”。但在客观上，义、利分别归属于“君子”和“小人”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儿“君子”指“劳心者”，即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小人”，指“劳力者”，即被统治的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包括平民和奴隶。孔子将“义”属之于“君子”，要求他们遵循；而将“利”归之于“小人”，让劳动者能够生存发展。（《论语·里仁》）孟子说：“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孟子·滕文公上》）董仲舒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传》）可见义利分归是儒家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君子大夫是行仁行义的，只有小人农夫才是求财求利的，因此食禄者的私利自然要受到抑制。

但董仲舒又指出，民众往往会“忘义殉利”，是因为“民暗于义”。因为对于百姓而言，“利”是小者，是眼前的、容易知晓的，而“义”则是大者，是难以知晓的。董仲舒举例而言，例如，婴儿面对枣和金银饰物，必然会选择枣。野人面对一斤金子与价值千万的珠子，必然会选择金子。这是因为对于婴儿来说，他只知道自己疾饿与否，因此枣是当下重要的。对于野人来说，其价值认知水平有限，只能了解金子是贵重之物。同样的道理，百姓之于“义”、“利”之间的选择，只能是以他们当下的物质需要和价值认知水平而抉择。董仲舒肯定这种抉择的合理性，他说“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暗也。”百姓趋利不趋义是自然的、合理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苛责于民众。这无疑是对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养其小体为小人，养其

大体为大人”思想的直接继承。孟子更加推重“义”，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义”，可以放弃生命。他谒见梁惠王时，讲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论点，是一段著名“公案”，引起后世争议不断，今天仍有人属文分析，各有词据。

两千多年来，董仲舒的义利观念成为中国伦理学的主流思想，为大众接受。“重义轻利”“舍生取义”“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这些观念，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道德准则。这一文化精神传承至今，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共产党员修养身心的原则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最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这种观点是对国家外交政策而言的，对于个人、家庭、单位、企业等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适用。

古代社会中，义利之论多数情况是个人的格局问题，往往是坐而论道、空谈虚论，很少有人能自我激励、躬身实践。共产党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定位，应该是以集体主义原则为核心，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

益；既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的正面作用，又要在行为准则上，超越市场法则和个人功利的局限，做到义利统一，以义节利，以义导利，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喻于公义、喻于民利、人民至上是最为鲜明的价值标识，是必须做好而不能有丝毫含糊的原则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小我”与“大我”的重要观点和思想境界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义利认识上的新高度，是我们修养党性的重要遵循。

一是融入大我，提升境界。

习近平寄语南开师生：“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希望你们脚踏实地，在新的起点作出你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成为南开大学新的骄傲。”

小我源自于天地自然，是生命的初始状态。人从一出生，就开始接触世界，开始接触“我”。从“我是谁”、“我叫什么”、“我要吃饭”、“我要睡觉”、“我要努力”、“我要获奖”、“我要成功”、“我要幸福”，慢慢的，就有了“我”的概念，这个“我”是原始的、自然的、狭隘的、自私的和小气的，甚至是懒惰的、依赖的和矫情的，就是“小我”。

大我源自于社会群体，是生命的高级状态。在与社会接触中，逐步发现，在我小小的空间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在我短暂的光阴之外，还有一个历史长河的流逝；在我的个人利益之外，还有共同价值目标，在我们这蝇营狗苟的“小我”之外，本来就有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大我”，本来就有一个能够与我们共存、共

生、共长的“大我”，本来就有一个历尽沧桑、博大深沉、默默陪伴我们的“大我”！

这个小我，让我们把目光愈来愈集中在眼前，把行为愈来愈局限在当下，把感受愈来愈框定在自身。于是，人就逐渐开始变得盲目、变得糊涂，变得伤感、变得脆弱，变得郁闷、痛苦和忧伤，并且渐渐失去了天真、快乐和笑脸。

把小我融入大我，就不会妥协于安身立命的一时之需，就不会在残酷的环境中忘记信仰与精神的独立，就会在改善社会与民生的过程中，为更广大民众的福祉提供服务，就会胸怀大局、坚持信仰，个人的价值才能够放大，生命才更加精彩。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二是保持自我，控制物欲。

经过多年培养，作为一名合格党员，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在任何时候，任何组织中，都起模范带头作用。胡锦涛说：“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作为党员个体，一时先进不等于终生先进，一段时间优秀并不代表永远优秀；曾经很优秀不代表现在和将来都先进都优秀。一个人从组织上入党是一次性的，但是思想上的改造，觉悟上的再提高，是需要一生的，紧密联系党的整体，不断地学习了解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结合自身工作为党的事业奋斗也需要一生的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必

须努力增强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一旦丢掉自我，失去精神追求，就没有了想法，没有了方向，行尸走肉一般在这个热闹的世界独来独往。又或者，想法很多很多，多到自己根本无从选择，不知道如何是好。又可能，在他人的指示下，茫然的听从，没有主见没有立场。还可能是，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在种种诱惑下，忘了本意，失了本心。

我们的很多党员，曾经是单位的拼命三郎，但走进了社会这个大染缸，面对社会百态和人间万象，经不起考验，在灯红酒绿中迷失自我，停滞不前，慢慢开始疯狂追求金钱和物质欲望，每天遇到的美好的人间幻象会让你忘记来时的路。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太多诱惑太多陷阱，迷失自我是分分钟的事。一个人如果迷失自我，也就是蒙着眼过独木桥，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正义与邪恶，当邪恶的力量压迫住正义，那么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要坚持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统一。共产党人从不否定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任何社会里，人们的物质利益是不可否认和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推动一切社会活动的客观动因。重视、维护和发展人们的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义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也要看到，物质生活和物质追求不是生命的全部价值所在。人除了物质追求，还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精神与物质协调发展是正确义利观的客观要求。

要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一方面，个人利益是社会

利益的基础，没有个人利益的实现，就没有社会集体利益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利益又依赖于社会集体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是满足个人利益的保障和前提。广大党员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以社会利益为重，树立大局观，在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自觉行动彰显共产党人义利观。

党员干部应当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由于受社会利益分化、社会价值多元化冲击，一些党员干部内心之“小我”不断膨胀，逐渐模糊了公私边界。尽管教训一再警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却总有人背弃公义、暗度陈仓，以公帑入私囊；尽管事实一再验证“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可总有人心存侥幸、触碰红线，恣意输送利益。公私之间的权衡取舍，照见一个党员干部党性的强弱。增强共产党员树立正确义利观的自觉性，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是我将无我，义薄青天。

2019年3月，意大利众议长菲科向习近平主席发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习近平主席回答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无我是一种人生境界。不是真的无我，而是说，当我们能够把“小我”和“大我”融为一体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去掉一切负累、感到天人合一、万物同宗、互为因果、互相支撑的时候，当我们

充满了力量、拥有了正能、体会到积极上进、轻松快乐、奇妙无穷的时候，我们仿佛就进入了一种“无我”的境界！

无我是共产党人的宗旨要求。境界决定格局。《党章》的总纲有规定：“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可以说，共产党人的“无我”不仅仅是体现为心中无私，更是体现在“心中有民”。习近平主席讲的“无我”是忘我，随时牺牲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宝贵精神，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厚情怀。从人民性的角度说，共产党人所讲的“无我”是远远高于宗教文化当中“牺牲”意义的，是对“无我”一词的新解、新用。

无我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每一种政治文化理念都有自己的根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个人无我无私是一种优良品德，个人品格的正直、公道与否和人格信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际交往的公正和社会的稳定程度。美德伦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仅强调个体道德的内在主体性质和积极意义，而且坚持把个人心性品德的完善看作一个自我努力完成的实践过程。美德在于成人，德性在于德行，传统社会无我无私理念的旨意并不局限于个体人格的养成，其更为重要的理趣在于“治国”“平天下”。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修身”“齐家”，而“修身”“齐家”的起点是“无我”“公心”“诚意”。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关于个人“无我”“公心”“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文化是历代政治家在探究治国理政方面最为关注的问题。

无我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在漫长的奋斗历程中，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共产党人一直用实际行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夏明翰等先烈们怀着“主义真”的追求，可以不惧生命安危；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断头”的紧要关头也坦然吟唱“意如何”。毛泽东则是用“无非一念救苍生”，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干革命那种“牺牲自我、服务人民”的大无畏精神。

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回答，彰显了一种博大胸怀。这与“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些朴实而深情的告白一样，体现出大国领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矢志不渝的思想境界和责任担当。

（六）“必仁且智”与共产党人的人才观

古往今来，选贤任能是我们的传统政治优势，并在实践中，创造了选贤任能的丰富经验和政通人和的盛世佳绩，“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我们今天称之为第一资源。今天不断地发扬完善，并在世界各国用人方法比较中日益胜出。

董仲舒看到了人才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观乎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知任贤奉上之功”。通过观察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人的春秋霸业成就，可以看到重用贤人尊奉君上的功效。他说“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他也看到了汉武帝求贤若渴的急迫心

情，“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

1.人才标准。

董仲舒多次提出“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谋于众贤，考求众人”、“载天下之贤方”、“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反复强调了选拔与任用贤德之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贤臣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方面，相对应的一方面就是明君，他又指出“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故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也。”通过对君王的规劝和名利的诱导，董仲舒意在实现君王之无为（或至少是不妄为）和臣子之有为的有机结合，珠联璧合，是实施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

董仲舒从他的人性论出发，把人才圈定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民。圣人天生聪明，生而知之，是天命所归，只有皇帝有此德能、享此名号，是使用人才的主持者；斗筲之民，愚不可及，不可教，也不可用。只有中民是选拔培养的对象。

他继承儒家传统，注重对人才的道德要求，但同时也关注才能方面的发展，提出了“必仁且智”的德才观，这种独具一格的德才观对之后中国社会的选才用才产生了重大影响。董的思想贴近政治实践，包含有大量的选拔优秀人才的原则与方法，对于德才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当代中国的人才建设同样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董仲舒非常重视人的德性，他说：“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

而操利兵也。”没有道德却有才能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就像手拿锋利的兵器却没有束缚一样危险，“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惑愚，其辩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有才无德之人，他的强大足以掩盖过错，他的强暴足以触犯伪诈，他的智慧足以迷惑愚者，他的辩才足以粉饰过错，他的坚定足以破坏法纪，他的严厉使人不敢提意见。可见，虽然拥有很强的才能，但若缺乏道德束缚，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与先秦儒家偏重于论述“仁”的君子道德不同，董仲舒将能否正确处理仁与义的关系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他认为君子的理想人格是在探寻仁与义的区别之上形成的“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的解读，找到了这种区别：“《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并以仁爱之心对人，才是《春秋》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对自己宽容爱护，对别人却要求严苛，就是乱了道理，不能算是有道德之人。董仲舒将孔子静态的“仁”观念发展为动态的处事原则，并将同为先秦儒家常讲的“义”作为“仁”的对立面，这样就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养成方法，即“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所以，董仲舒的德是以“仁义法”为基础的，能够正确处理好仁与义的关系，就是有德之人。

董仲舒的才能观集中表现为对“智”的论述。他首先论述了何

谓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可见，董仲舒认为才能的首要方面是具有预见性，事先能够凭借才能预见事情的优劣利弊，认清利害关系，善于通过细微之处观察事情的发展趋势，在对事情的整体性具有把握之后，设定计划，后续事情的发展与设定的计划相符合，这就是有才能的人。

除此之外，董仲舒还提到了“智”的另一个方面，“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是“讷于言”的，但董仲舒却认为良好的辩论技巧与论述问题时的说服力也是才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才能的人说出的话要有说服力，前后一致，让人无可辩驳；其确立的原则，让人难以废除；其得出的结论，让人难以舍弃。总之，在论述问题时能够做到“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行为符合原则，言论切中要害，这也是才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必仁且智》篇中，董仲舒提出了仁与智的辩证关系，即德才关系，他说：“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董仲舒认为，仁与智对于人格的生成来说，是最紧迫的两个方面。仁而不智，则虽有爱人之心，却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智而不仁，虽然能够预见事情发展的结果，却不愿使事

情向好的方向发展。这里，董仲舒集中从反面论述了“必仁且智”的重要性。对儒家过于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董仲舒进行了理性反思，在道德要求方面，使仁义对立，在论述二者关系中探寻道德修养之道；在才能方面，重视做事的预见性与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德才关系方面，讲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对德才关系的论述能够如此的全面与科学，实在是难能可贵。

2.选拔培养。

政策的制定靠人，执行也靠人，人的因素是社会治理和一切工作的核心问题。董仲舒说：“任贤臣，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不妨说董仲舒的选贤任能思想正是其理想政治实现的核心环节。

开办学校，既是推行教化措施，也是培养人才的途径。认为“养士之大，莫大乎太学”，主张兴太学“以养天下之士”。将上古举贤养士的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与《礼记·王制》所记载的古代选贤任能之制极为相似地，董仲舒认为求贤的先决条件在于养士，不养士而希图贤才，正如不琢玉而空求文采，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如果不更化秦政，那么就无以从民间选取贤德之士。董仲舒认为，应该在太学中安置名师，培养天下可用之士，对他们多次考问以充分发掘他们的才能，则英俊人才可以得到。

从官员的简拔途径来说，董仲舒直言目前的长吏多出于郎中、

中郎，而郎吏选拔又以家族的财货资产为准，能够进身的多是俸两千石的官员子弟，他们未必贤能。董仲舒认为，养士和选士是分不开的。应通过选举、贡贤的方法，把那些真正有德有才的人推荐上来，“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

董仲舒提出使诸侯、郡守以及各两千石大员从其官吏民众中选取贤能的人，每年举荐两人做皇帝宿卫之官员。以此，不仅打破了原来官吏和富豪阶层的政治垄断，同时还可以作为官员考核的一项标准，以其所举荐之人的贤与不肖来观察其本身的政治眼光和政务能力。

在《礼记·王制》中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儒学传统对选贤任能的强调不仅涉及所谓权贵阶层，还要给民间教化以相当大的努力和耐心，选取贤德的平民进入政治体系。这正是董仲舒力图复兴的政治传统。在治理层面上，董仲舒所要求的是打破长吏和富豪的官位垄断，开放政权，多管齐下为国家提供更多更加专业，并通过业绩标准来考评工作成果的官吏。由此，亦可使武帝“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古今一理，今天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内部需要持续巩固完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外部面临非常强大而紧迫的威胁，需要有一代人才团队来完成历史任务。但是，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百年变局的砥砺前行，今天我们对人才的需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习近平同志说：“人才是第一资源。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我说过，要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干一番大事业，就要有这种眼界、这种魄力、这种气度。”

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当前，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及作为其载体的人才已成为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本与科教兴国密不可分。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各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在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集聚一大批优秀人才，占领人才高地，更有着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人才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大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才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拥有优秀人才，拥有尖子人才，拥有强大的人才队伍，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强国梦的必由之路。

董仲舒把“必仁且智”作为人才的基本标准，而且要求在人才使用上，主张“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人才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有才能，有远见，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等等。我们党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所要解决的是“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德，是指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才，是指能力和水平。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应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德与才都不可或缺，但德与才比较，德是第一位的，是才的统帅，决定着才的作用和方向；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范围；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终究要败坏党的事业。政治品质、道德品行不行的人，才干越强干坏事的能量就越大。因此，选人用人，一贯既看才，把才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条件，更重德，以德

为先决条件，突出德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

董仲舒的主张打破了以资选人和选官吏子弟的陈旧模式，开辟了以学选人、荐举人才的新路，为西汉国家的兴盛创造了人才基础。今天我们的人才选拔方法更为科学，路径更为广阔，对各级领导干部选人用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有一双识才慧眼，聚天下英才而广用之。千里马需要伯乐的发现，金子需要淘金者的发掘，党员干部要擦亮识才的慧眼，挖掘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而用之。其次，要有容才得雅量，正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不可能呈现完美，党员干部对人才不可有太多挑剔，要能够看到他人的优点，从大局的方面因材施教、适其所专，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其三，要有用才的良方，竭力激发人才全部潜能。给人才“压担子”，把真正的好人才培养出来。为人才搭建合适的“舞台”，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党员干部要拴紧“责任链”，强化对人才的管理。

令人可喜的是，近几年各地的“人才争夺战”代表了社会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各地政府为吸引人才而高频出台系列人才优惠新政，进而造成人才资源争夺的现象。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17—2018年间西安、天津、上海等共计100多个城市先后出台人才新政，有人称2018年是我国“人才大战元年”，到2019年12月，全国发布相关人才新政的城市已超过160个，其中近40城发布人才购房新政。德州人才引进“黄金30条”升级为“黄金40条”，持续激活人才存量、增加人才流量、壮大人才总量、提升人才质量，不断强化人才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实施“人才兴德”行动、建设新时代区域性人才聚集高地。

“人才争夺可以优化国家人才配置，促进大、中、小城市更加平衡地发展。”中国社科院刘彦平表示，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创新创业，人才就是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核心资源。严格按照人才选拔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激励他们展示自己的才能。尤其是一些创新性人才，他们往往资历浅，学历不高，没有职称，如果不能给予机会展示才能，就会埋没人才，更应当“不拘一格选人才”。激励他们为社会做贡献，从而实现其价值。破除人才选拔年轻论，不管他年龄大小，只要其有创造，有贡献，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比较高，就应该给予相应的职称和职务，给予相应的待遇，以更好地激励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

（七）“至廉而威”与共产党人的廉洁自律

董仲舒本人一生积极弘扬儒家道义，坚守廉洁正直的为人准则，是清正为官的典范。《汉书》上说，他“为人廉直”⁶⁵，既不阿谀奉承、曲意从人，也“不问家产业”⁶⁶、厚殖财富，为人为官为学，都能做到正身直行，率先垂范，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学士皆师尊之”⁶⁷，特别是以学业为生的广大士人，把董仲舒奉为榜样和楷模，被时人誉为“群儒首”“儒者宗”。。

董仲舒结合当时的社会需求，阐发了一系列立国治世的思想主张，现在看来，当时所提出的一些选拔、管理和考核官员的建议虽然稍显粗略，但是其“至廉而威”思想所表达的廉政主题，值得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借鉴。

⁶⁵ 《汉书·董仲舒传》

⁶⁶ 《汉书·董仲舒传》

⁶⁷ 《汉书·董仲舒传》

“至廉而威”是董仲舒对伍子胥的评价，他说：“义而后行，至廉而威，质直刚毅，子胥是也”。意思是说最廉洁的官员才能有最信服的权威。

在他看来，清正廉洁是世人所期望的为官者的优秀品德和人格追求。有了这种品德和人格，才能忠诚于民，让利于民，取信于民。正所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清碑·官箴》）廉洁自然产生权威。

廉者心正，处处以礼义为先。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这段话是对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最好的注释。言正、心正、身正，是为官立威的基础。

廉者自律，董仲舒提出君主只要自厚其德，重视孝悌并爱好礼义，百姓自然会听从教化，而善行义举也由此应运而生。各级官吏应通过自觉反省来提高自己的德性，以“义”规范自己的行为，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矫正自己，强调统治者应当按照“仁”、“义”等道德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用礼义约束自己的欲望。为官者自身的廉洁、正直是国家廉政建设的基础和保证，也是社会廉洁风气的基础。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政治的腐败、社会贪婪风气的形成，都是与主要领导者的作为分不开的。为此，董仲舒十分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对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党员干部要像董仲舒一样，做人正直，办事公道，敢说敢干，行得正，坐得端，无后顾之忧。

廉者无私，坚持不生意外财。董仲舒本人在实际生活中坚守了自己的主张，史书记说，董仲舒“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他对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为都进行了批评，而且直接批评了汉武帝对财富的贪欲。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廉洁之人站在贪腐之人面前，无形中显出一种威严，让常人敬畏，让小人胆怯。抗拒腐蚀应从小事做起，于细微处见精神。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要清廉为官，别有用心之人就无计可施了。我们党员干部需要摆正心态，克服私欲，淡泊名利，加强自身的世界观改造，保持平和的心态，找准自己的人生航标，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廉者爱民，始终不与民争利。廉洁之人多爱民。在封建社会早期，董仲舒就意识到官员与民争利的危害性，反对过分剥削人民，提出从经济上消除吏治腐败的根源，体现出他对现实民众疾苦所寄予的深切关怀。他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君主才能无敌于天下，因此，提出君主应有爱民之心。董仲舒坚决反对官员家人从事产业经营活动。他在《天人三策》中突出强调：作为统治者应“不与民争利”，给汉武帝举了个例子：

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宰相叫公仪休，以清正廉洁名传于世，回到家中，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当即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里吃饭，吃到自家园里种的葵菜，气愤地把园里的葵菜都拔了，说：“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与种菜的农人和织布的女工争夺利益吗？”通过这个例子，董仲舒向汉武帝说明，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且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董仲舒认为，官员不置产业、不与民争利，因为“天亦有所分予”，这是天理，他有句名言：“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⁶⁸。长着锋利牙齿的动物没有坚硬的头角，长着翅膀的动物只有两条腿走路。天不兼予，人不兼利，这是“上天之理”，也是“太古之道”，古今通行的道理，国家应把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各级官吏也应作为行为准则来遵守执行。

董仲“分予”思想的核心便是反对封建官僚与民争利，他明确提出：“食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⁶⁹。如果“食禄”的官吏“夺园夫红女利”，实际上是与老百姓抢饭碗。从社会分工角度而言，从事生产劳动是一般民众的事，而各级官吏是靠国家俸禄进行治理社会人，因此，董仲舒反对这些封建官吏“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做法。

权力与产业直接结合，亦即官员直接经营产业，会给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成千上万个官僚，有行政权力又拥有大量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这就赋予他们剥削下层民众和腐蚀国家政治的双重性质。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存，兼并土地，导致了农民的大量破产和贫富的严重分化，除引起吏治腐败外，还利用超经济手段攫取财富，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它比以经济手段获取财富更容易引起劳动人民的怨恨和不满。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就明确提出官僚只领取体禄，不经营产业的主张，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其患祸必至”。董仲舒这一思想，今天仍然值得

⁶⁸ 《汉书·董仲舒传》

⁶⁹ 《汉书·董仲舒传》

学习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廉洁底线。公务员参与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很明显。首先，会造成不正当竞争，影响社会经济秩序，损害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其次，影响本职工作的开展。公务员参与经营活动，无疑会分散精力，降低工作效率，甚至产生工作失误。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极易滋生腐败。公务员受到一些经营活动的利益诱惑，极易产生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可见，规范国家公职人员从政行为，重拳整治公务员违规参与经营性活动十分必要。

作为人民公仆，我们的党员干部应该坚决做到“清廉、务实、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引领广大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共谋事业，真心实意为人民办事、解难题，坚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为了提高君主和各级官吏的道德修养，用统一的道德标准来规范统治者的行为，董仲舒提出了“五常”说，希望以此道德规范体系作为约束统治者，保障廉洁清明的思想武器。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伤也。五者修伤，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这“五常之道”成为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修身立命的人格标准，以此为基础，把改造社会、治国安民视为人生的最高归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奉行不悖、躬身实践，成为一种理想状态的人格追求。

在历史上，这种理想人格的影响往往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和国家、为社会尽责、为百姓请命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许多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

这种理想人格的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对此有很深的理解，并加以继承和发扬，成为共产党人修养的一部分。党的历代领导人，不仅从理论上批判继承了这一思想精华，把它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修身武器，纳入了思想建设的理论体系，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成为后人敬仰的典范。习近平同志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是我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深入探究董仲舒思想的启发和借鉴，以期为加强党员的个人修养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一股新的清流动力。